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Early Chinese New Literature Writers

李春——著

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

早期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翻译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11XJC751002)

李春——著

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

早期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翻译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早期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翻译研究 / 李春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 12

ISBN 978-7-5117-3716-8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6046 号

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早期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翻译研究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王 琳 景淑娥

责任印制：刘 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010）52612341（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010）52612346（馆配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324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9.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目 录

导 论	1
一、翻译的界定	4
二、文化选择中的主体建构	11
三、研究现状	22
四、文学史视野中的翻译动机：对象、视角、方法与 论题	31

上 篇

第一章 从“律德来久”到“文学”：新文学观念的 形成	41
第一节 “literature”的移用与文学革命的发动	42
第二节 文学革命思路的调整	46
第三节 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	49
第四节 新文学建设方案中的翻译	62

第二章 由白话而欧化：翻译与新文学的语言方案	68
第一节 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的合流	69
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化与“欧化”的提出	93
第三节 新文学的欧化语实验	115
第三章 翻译与新文体的创造	128
第一节 多重翻译策略中的诗体探索	129
第二节 “Poem”与“Poem in Prose”之辨析	156
第三节 “Short story”及其不满	167
第四节 “Essay”与传统资源之消长	179
第五节 “易卜生热”之后戏剧的困境	187

下 篇

第四章 再造文明：社会改良中的文学改良	199
第一节 真国民：社会改良的精神基础	200
第二节 新文体：社会改良的交流机制	206
第三节 实验主义：再造文明的理论依据	211
第四节 “好政府主义”：再造文明的制度保障	217
第五章 文化比较中的历史危机与救赎	223
第一节 作为新伦理的科学	224
第二节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比较文化视野与 翻译的使命	227

第三节 “内曜”与“心里的烦闷”	232
第四节 “反诸己”与世界主义	247
第六章 从“人的文学”到“为人生”的文学	261
第一节 “新民”思潮下的早期翻译	263
第二节 “移情”与文学的“趣味”	275
第三节 善种学与“人的文学”	282
第四节 “为人生”与翻译的使命	293
第七章 “红男绿女之小说”中的“文学”	307
第一节 滑稽消遣中的人生警示	309
第二节 以正面形象“作个人之志气”	323
第三节 以负面形象“输荡新机”	329
第四节 以“正轨”“救说部之流弊”	337
第五节 以“意识情感怀抱”藏纳于文	342
第八章 世界文学版图中的艺术与理想	349
第一节 培育“社会种子”	349
第二节 知识与价值：多重空间之间的纠葛	358
第三节 主潮之外的世界文学版图	373
第四节 描写方法的模范：自然主义	395
第五节 使人不失望：从表象主义到新浪漫主义	403

第九章 “风韵译”与新文学的身份	421
第一节 “风韵译”的诗学阐释	421
第二节 “风韵译”的主体策略及其论争	433
第三节 翻译主体与新文学的身份想象	444
结 语	455
参考文献	459
后 记	468

导 论

纵览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字生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既是新文学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参与过各种各样的翻译活动，介入了形形色色的翻译论争，也提出了各有特色的翻译理论。与此前的中国文学不同，中国新文学从发生起，历经的多次转折，基本都与翻译有关。考察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过程，不可忽略翻译的作用。

在一段时间里，学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相比，中国新文学作家总体上具有更高的外语素养，对外国文学的关注更为密切。这一特征使得某些人在反思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时，甚至认为正是对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和借鉴，让中国新文学具有了比中国当代文学更高的美学价值。从这一具体视角来判断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上的优劣是否妥当，暂存而不论，但翻译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问题，确实是研究者无法忽略的。在这方面，当下学者的任务之一，就是积累足够多的个案研究，形成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整体性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系统深入地描述翻译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

在进行这一工作前，有必要对翻译进行清晰的定位。

对于翻译，在不同的学科中，学者们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传统的翻译研究，也被称为翻译批评，主要从翻译的技术层面着眼，判断翻译“精确”与否，探讨以怎样的方式可以实现“精确”的翻译。

此外，比较文学研究也将翻译研究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比较文学媒介学考察某国文学、某位作家、某种思潮、某类体裁的作品进入另一国的方式或者所依赖的媒介。而翻译被视为这种媒介之一。不过，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翻译过程中的变异不可避免，因此，将关注点从实证性的语言变异现象转移到了对变异现象的文化解释上，由此，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突破了媒介学的范围，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类型。

大约在 30 年前，翻译研究界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研究者们不再着眼于技术层面的描述和探讨，而开始转向了文化层面的研究，着重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来解释翻译现象；其关注的重心，也由原文转向了译文。这被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得以成立。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理论，如翻译与性别、翻译的政治、翻译与后殖民、生态翻译、翻译伦理等。文化转向所定下的基本格局，虽然也暴露出了不少的缺陷，但面对种种挑战和质疑，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文化”这一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翻译研究要彻底颠覆文化转向以来的基本格局，还需时日。

由于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密切，翻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部分学者对翻译的这一地位认识不够明确。比如，在某些研究中，翻译文学被直接视为“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也被转化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由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和文化建构的努力就被忽视了。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相关理论、方法的输入，不少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翻译研究，探讨翻译现象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取得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但就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格局来说，这些研究还只能说是开了个头，还有大量的个案处于认识盲区，整体性的描述就更谈不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着眼于翻译对文学革命这场运动的影响，考察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即是想为这项浩大的工程做一点铺垫性的、探索性的工作。本书将致力于厘清个案——包括五四时期重要作家的翻译作品、翻译活动、翻译方法、翻译思想、翻译论争、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宏观地认识翻译在中国新文学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同时，通过翻译问题的研究，对文学史、文化交流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理论性的看法。当然，因为研究对象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是一群个性赅张的历史人物，是一个个元气淋漓的文本，是一场场错综复杂的事件，在行文过程中，本书也将或隐或显地表达一些对这段历史的判断，因为我相信，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仍可以从五四找到源头，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仍可以从五四找到智慧的生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研究不仅仅是出于学科发展逻辑的要求，也是通过展示这些耳熟能详的现代作家文字生涯的另一面，为我们进入那一段历

史、走近那一群人物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因而，本书所进行的翻译研究，虽然有自己独特的领地（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这个领地似乎显得过于狭小），看似专业性强，但也只是进入历史的一个入口，是解决自身思想和精神困惑的一种方法。它只是话题较为特殊的一种文学史研究。

一、翻译的界定

本书要讨论的，是五四作家的文学翻译与新文学的发生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对研究对象本身作一番探讨。

关于翻译，中国历代有多种称呼。比如《周礼·秋官》中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又《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另外，《国语·周语》又记载：“夫戎、狄，冒没轻儻，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在这里，象胥、寄、象、狄鞮、译、舌人等，都是指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当然，其具体职责，又有差别。比如，“寄”是通传东方语言的人，“象”是通传南方语言的人，“狄鞮”是通传西方语言的人，而“译”是通传北方语言的人。以“译”来统称所有的翻译，可能不仅仅是语言演进的结果，更与民族势力的消长、民族关系的发展、民族融合等历史现象有关。

从晚清到五四，仍有人以其特有的称谓来指称翻译。比如，严复称自己的《天演论》是“达悌”；梁启超、罗孝高合译的《十五小豪杰》被称为“豪杰译”；林纾的翻译是“口述”加“笔述”；另外，周作人翻译的《女猎人》被称为“假造”；郭沫若称自己的诗歌翻译是“风韵译”。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统称的“翻译”，实际上包含着不同的语言转换活动。这些活动曾经有不同的称谓。在这些不同的称谓背后，则是人们对这一行为的不同理解。而这些理解又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更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种历史实践，而尽量避免讨论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以绕开理论化、玄学化的深渊。

在西方，翻译也有多种称呼。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翻译学》（*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谈到西方几千年来的翻译论争时说：

在翻译领域，有关行为指导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争论，表现在用来指称翻译行为的词汇的丰富性上；这多少为“translation”（翻译）这个基本的词语，创造了多个同义词，并证明了翻译过程的多维性和同义词各自所赖以存在的本质性目标。^①

这段话提醒我们，要给翻译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

^①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27.

的。在每一个人那里，“翻译”都有独特的含义。威尔斯举例说，在德语中，除了“Übersetzung”外，还有“Übertragung”“Umsetzung”“Abbildung”“Nachbildung”等十个单词，可以表示“翻译”的意思，但它们的意义又有略微的差异。因而，每一种具体的语言转换行为，只能用某个特定的词语来称呼。

不过，这些用来指称语言转换行为的词汇，逐渐统一在了“翻译”（translation）这一名目下。但对具体的语言转换行为进行必要的区分，促使一些理论家开始对翻译进行分类。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非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莫属。他将翻译分为三类：

1. “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或 rewording），在同一种语言中，用另外一些语言符号（verbal signs）来对语言符号进行解释；

2. “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或 translation proper），即用其他语言中的符号来解释某些语言符号；

3. “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或 transmutation），即用非语言的符号系统（nonverbal sign systems）来解释语言的符号。^①

一般来说，我们谈论的翻译主要还是第二类——“语际翻译”。但这一分类标准很难被用来讨论现代中国的翻译现象。比如严复的《天演论》，自然算不上语内翻译，也算不上符际翻译，但也很难归入“语际翻译”，因为他故意略掉了许多原

^①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Venuti Lawrence ed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39.

文的内容，加上了自己的解说，融入了许多中国的思想、人物、典故，更像是在阅读了原文后进行的新创作。

另外，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一个人在阅读了某个外文文本后，并未用自己母语将其信息行诸笔端，而只是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甚至可能在阅读者的头脑中用自己的母语形成一种自言自语的对话，或者转化成某种观念，即所谓“mental translation”（心译）。比如，鲁迅说自己的创作全靠先前“读过的百十来本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常识”。这“百十来本外国小说”，鲁迅并未全部用文字翻译出来，但在阅读过程中，在头脑中会有一个类似但又不等同于翻译的过程。而常用的“翻译”概念却不允许我们把这样的现象称为“翻译”。

针对这种现象，乔治·施泰纳（George Steiner）将翻译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了。

施泰纳所理解的翻译，有两个层次的涵义：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即将“意义”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里，这相当于雅各布森所说的“语际翻译”。其次，是广义的翻译，即对编码或者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比如，他说：“所有表达性的言说与解释性的接受过程都是翻译的过程。”^① 因此，翻译理论，也就是关于语言的理论，关于意义的理论，关于文学的理论，关于文化的理论。

基于这种翻译观，施泰纳将关于翻译的讨论，由两种不同

①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8. 原文为：“All procedures of expressive articulation and interpretative reception are translational.”

的语言之间的意义转换，延伸到了不同的文本、文学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上。由此，他提出了文化拓扑学的概念（*Topologies of Culture*），试图为翻译进行定位。

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的第六章“文化拓扑学”的一开头，施泰纳首先提到雅各布森的翻译分类：语际翻译、语内翻译，以及符际翻译。他对符际翻译这一概念作了一番发挥。他认为，符际翻译是通过任何可能的中介或者符号系统而进行的信息交换，包括通过非语言的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这一过程。由此，他甚至把生命的存在也看作是一个翻译过程：“个体与种群的生命，全靠对一系列生命信息的迅速和（或）精确的阅读与解释。色彩、声音、气味、质感和姿势，都具有一个和语言一样丰富的词汇表、语法和语义学。”^①

如果我们利用施泰纳对符际翻译的解释，反过来理解前两种翻译概念，那么，我们的视野马上就开阔很多了。翻译不再仅仅是指把某种意义从一种语言准确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它还包括改述（*paraphrase*）、图示（*graphic illustration*）、仿作（*pastiche*）、模仿（*imitation*）、主题变化（*thematic variation*）、戏仿（*parody*）、支持性或者颠覆性的引用（*citation in a supporting or undermining context*）、伪托（*false attribution*）、抄袭（*plagiarism*）、拼贴（*collage*）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行为，都涉及意义的转换与继承。施泰纳主张把“*alterity*”

①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37 - 438.

(变替) 或者阐释的观念引入到意义或者文化的继承这个更大的问题上来。

现在, 重要的是, 在这种继承中, 哪些因素被保存了下来, 哪些因素有所变化以及如何变化的。为了表述这种变与不变, 施泰纳引入了拓扑学的概念。

Topology 原意是地貌, 后来被莱布尼茨用来指研究“拓扑空间”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的学科, 从而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变换与不变, 是拓扑学中的两个重要关注点, 比如, 从篮球到橄榄球, 其外形有所变化, 但它们的拓扑结构, 始终一致, 即都是球面空间。

在翻译乃至文化的传播中, 变与不变是常见的现象。施泰纳在分析了不同的作曲家对同一首诗歌所谱写的不同曲子后说:

在先前的语言事件 (verbal event), 以及随后用另一种语言或者非语言的形式来对这一事件所进行的再现之间, 所存在的这些多重的转换与重组, 最好可以看作是拓扑学的 (topological)。^①

这些变换包括语言 (verbal)、形式 (formal)、主题 (thematic) 和模式 (modual) 等方面。而变换的形式包括替换 (substitution)、排列 (permutation)、互相激发 (interanimation) 等。

^①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47.

施泰纳列举了历代诗人对诗人之死与其作品的生命之间的关系的书写，指出有些诗人虽然并没有提及死亡或者担忧自己作品的生命，但实际上仍然涉及了这一主题。这种变与不变，从传统的翻译或者影响的视角来看，是难以发现的。而在文化拓扑学的视野下，这种联系清晰可见。

施泰纳将翻译的问题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意义和文化的继承问题，既然是继承，就必然有完全与不完全的程度差别，有准确与偏离的差别。这样，我们的焦点从评判翻译的忠实性，转移到了一个语言、符号、心理、文化上的追问：在何种程度上，文化是已有的意义的翻译或重述（rewording）？

施泰纳将文明的存在与翻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所经历的过去是一种语言的建构。历史就是一种言说行为（speech-act），对过去时的选择性使用。”“每一代人都用语言来建构一个与自己共鸣的过去（resonant past）。”“艺术与文学的存在、人们在某个群体中所感知到的历史的现实性，都取决于一个从未停止的——然而通常是无意识的——内部翻译行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拥有文明，是因为我们从时间中学会了翻译。”^① 施泰纳的意思很明显，文明就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继承，而这种继承，有一个“阅读”、理解和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翻译”。这样，将翻译理论扩展到文化关系，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毫无疑问，施泰纳的这一理论，优缺点都十分明显。一方

^①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9 - 51.